

中国社会转型春秋 2

卢跃刚 著

在那酒神徘徊的地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5  
499

中国社会转型春秋 2 卢跃刚著

在那酒神徘徊的地方



\*200200488\*



(京)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那酒神徘徊的地方：卢跃刚报告文学集／卢跃刚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9

ISBN 7-5004-1593-1

I. 在… II. 卢…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选集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1378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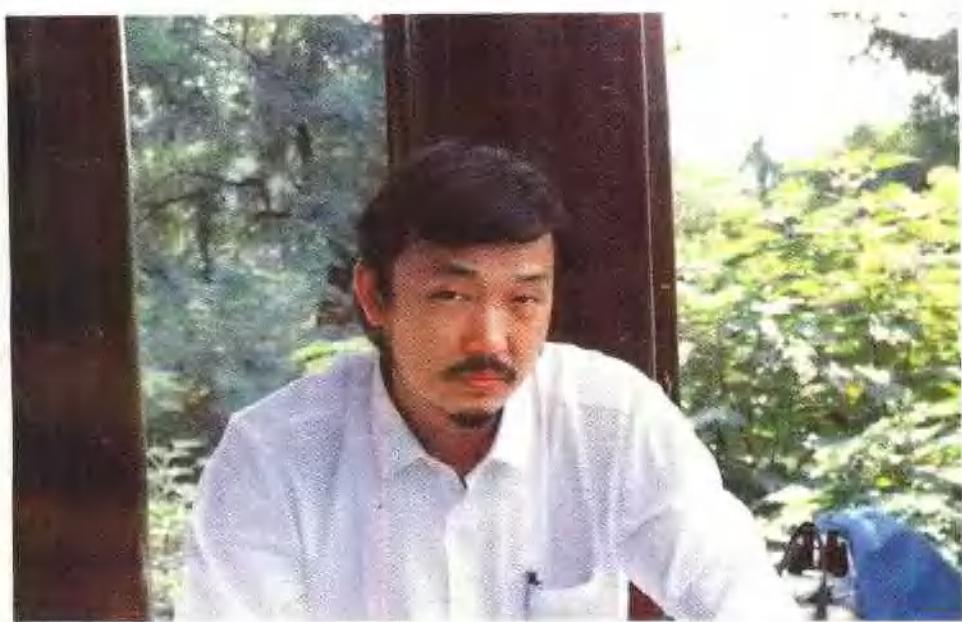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 插页：3

字数：256千字 印数：1—15000册

定价：11.00元



# 转型期报告文学的遐思

## (代序)

卢 跃 刚

那是个酷热的下午，我突然接到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通知，告诉我，该所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将在两天后讨论我刚刚出版的一本报告文学集。

这让我大吃一惊。经济学家们怎么会对报告文学如此感兴趣呢？经济学研究与报告文学写作，在通常的观念中，无论如何是两个相距甚远的领域。经济学家为一部文学作品召开讨论会，这在文学界是绝无仅有的。“经济”之道，“文学”之道，如同孔雀东南飞。研究对象、思想方法、参照系统、语言构成，都不搭界。听说国外一些科学家和学者读文学作品，也大多是茶余饭后松弛神经消遣人生罢了，如果硬给那种茶余饭后的消闲塞进报告文学的“严峻”，实在不敢想象，那将是怎样的局面。我相信，任何一位作家都不会那么不人道。

在文学家看来，那些理论学家多半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怪物，多半是那形而上学的天空中靠声纳导航、东奔西突的蝙蝠。文学家从来都恐惧“理性”的病毒侵害想象的肌体。于是歌德说，理论是灰白色的，而生命之树常绿。可在理论家看来，那些文学家多半是胡思乱想的疯子，文学则是这些精力过剩的疯子的收容所。偶尔，两者

互相匆匆一瞥，瞬即离去。这些经济学家告诉我，这些是天大的误会。这是一批制度经济学家。我被告知，制度经济学恰恰是把人类的社会行为中诸多普遍现象及其制度后果作为素材，来进行经济学研究的。他们的体系中，注重案例研究，注重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不容易察觉的细枝末节，并赋予某种经济学的含意。他们在这种鲜活的发现中感受到理论的快乐。在他们的人生态度和治学精神上，我看不到那种生不逢时的沮丧。他们在冷眼的去处，观察着一个十二亿人组成的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翻云覆雨，没有规矩。他们庆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中。因为，只有这种社会，才会有如此丰富多采的现象和素材，才会有无数充满魅力的可能和选择。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现实社会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无所不在他们研究的视野之中。这些经济学家，喜欢听故事，喜欢讲故事，喜欢发现故事，喜欢在平平常常的故事中挖掘出深奥的理论来。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过文学青年的经历，至今对文学创作抱有一种敬意，而且特别注意非虚构文学记录下来的社会和历史的状态。显然，他们把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当作了一个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可靠媒体，一个汲取理论研究素材的源泉。特别是在舆论一律和信息短缺的情形下。

经济学家如此，其他方面的读者呢？

任何文学现象都有其生成的社会需求和社会背景。不能想象，作家能游离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状态写出伟大的作品来；不能想象，一部严肃的作品会是作家完全无视社会存在和灵魂痛苦的自娱自乐的产物。除非他有其他方面的追求和企图，故意用自己的智力和技巧拿自己拿大家开涮。我们大可以轻轻松松地过日子，大可以风流潇洒超凡脱俗，大可以牢骚调侃游戏人生，可我们无论如何摆脱不了生活中的诸多烦恼，无论如何摆脱不了生存环境的窘迫。这方面，米兰·昆德拉实在是中国作家的一面镜子。读

米兰·昆德拉的全部作品，我们能强烈地感觉到笼罩在作家和作品头上的两个巨大的阴影，那就是“布拉格之春”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以及众多捷克人生命和精神的“流亡”。他对那种精神和信念的媚俗的无情嘲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一定要给文学带上社会责任的沉重枷锁是非常不明智的。文学从来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精神生产过程，在那不正常的年代里，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可话又说回来，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可能不去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政治、关注人生中最敏感的部分；不可能不进行形而上的思索，不可能不进行超乎寻常并逼近终极价值的理性梳理。我曾与一位很有成就的画家探讨过“理性”问题。当画布上的某一个光点、某一条色彩紧紧抓住画家的某一个意念、某一个灵感时，接下来的“发展”便需要“判断”了。那么，支持“判断”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报告文学作家与小说家不同的是，它必须直接面对社会写作。对此，他没有任何躲闪和回旋的余地。他必须剖开胸膛直面现实，否则，就别干这种行当。他需要信念、需要勇气、需要激情、需要经验、需要体力、需要坚韧、更需要由判断和把握所构成的理性。

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艰难又非常幸运的。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我们生活在一个牵动世界的转型社会中，直截了当地体验着社会脱胎换骨的激变过程，而这个过程，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只是有限的几次。一次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次是晚清和民国初期，第三次便是 1978 年开始、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的变革。我们在文献中看到，转型社会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师辈出，群星灿烂。至今，我们还沐浴着先贤的芳泽。

我们多少有点高山仰止的心情。

“仲尼厄而著《春秋》。”这位博大精深的老人，真是不屈不挠，携弟子周游列国，终生颠沛流离，悲叹礼崩乐坏，致力于道统秩序

的归复与重组。朱熹对这种努力评价甚高。他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晚清与当今社会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李鸿章曾说：“中国所临之变，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但是如何变法，一直争论到今天。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段里，中国人面对着西学东渐、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产生了“体”、“用”之说。由保守主义到激进主义，又由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来来回回，莫衷一是。其要害是，怎样对待传统，采取激进还是渐进的方法步入现代社会。经过1989年巨大的社会震荡，痛定思痛，人们开始关注晚清的历史，比较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作为对新权威主义的反拨，出现了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并在反省的基础上形成了建立秩序、平稳过渡、渐进发展的社会共识。

这是一种极具建设性的转变。社会进步由浪漫回到了现实，由激进回到了渐进。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由狂飚突进发展到浪漫理性，又由浪漫理性蜕变到了客观理性。

1989年后的报告文学，正是在客观理性的认知上逐步展开的。相比而言，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面临的局势更严峻、更艰苦、更复杂；负担更沉重、路途更漫长。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幻觉。我看时间正牵引着一匹骏马踢踏而来，天边划过一抹喜悦的酥红。

1994年8月31日凌晨

责任编辑 钱红林  
责任校对 柳生  
封面设计 鹿耀世  
版式设计 李建

## 目 录

转型期报告文学的遐思(代序) .....	1
在那酒神徘徊的地方 .....	1
乡村八记 .....	67
创世纪荒诞 .....	166
——“傻子瓜子”兴衰记	
“关广梅现象”回顾 .....	212
超越世纪：性艺术在中国 .....	259

# 在那酒神徘徊的地方

## 引 子

这是一场斥资一千余万元、令国人瞠目的恶斗！

名不见经传的贵州醇酒厂竟以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诉由，将声威远播的中国白酒业霸主贵州茅台酒厂送上了法庭！

茅台酒厂亦不显弱，以雷霆万钧之势给予反击，诉贵州醇酒厂“商标侵权”。

这便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受理了贵州醇酒厂诉茅台酒厂“不正当竞争”案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受理了茅台酒厂诉贵州醇酒厂“商标侵权”案。1993年5月26日这天，两案同审，贵州醇酒厂和茅台酒厂将互为原被告而对簿公堂！

这便使两家酒厂在台下历时数年的叽叽咕咕互相攻讦和指责公开化、白热化了，由夜郎国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是非非，眼花缭乱。

一边诉茅台酒厂酒名、外包装和瓶型全版仿冒“贵州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市场，欺骗消费者。

一边诉“贵州醇”“贵州”二字，侵犯茅台酒厂“贵州大曲”的“贵州”商标权利，进而证明茅台酒厂生产“贵州醇”的合法性。

天底下竟有这等蹊跷的事情：“茅台”乃堂堂“国酒”，怎么

• 1 •

可能屈尊仿冒在此之前世人鲜知的“贵州醇”?为什么两家贵州的企业,不在本地打官司,偏偏要从贵州高原的大娄山下和南盘江畔跨越北回归线,不远千里来到天气已是大热的广州摆擂台?

乍一看,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

“贵州醇”的原产地是贵州兴义市。“兴义”在哪儿?如果没有这场官司,局外人恐怕不会去贵州版图西南部的某个角落去寻找它。传说黔西南是古夜郎国的所在地。“贵州醇”是否正秉承着祖先被嘲笑了两千多年的精神,不知天高地厚地向“茅台酒”挑战?

然而,这场较量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并开庭后,一年多没有下文。在这焦灼对峙期间,与此案相关联,“贵州醇”又先后在贵阳、北京频频兴讼,官司套官司,把这场罕见的官司打得风云变幻,波澜壮阔。

“贵州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贵州醇酒厂厂长、“贵州醇”低度酒的创始人鄢文松亦成了令人注目的风云人物。

—

在鄢文松看来,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绑架”。

1993年11月15日下午,两辆小车朝贵阳急驶。车上,除了鄢文松外,还有贵州黔西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和兴义市的党政要员:州委副书记、州委副秘书长、兴义市委书记、兴义市长和原市长。

兴义到贵阳,北上三百六十公里,道路险峻而漫长。无论是“绑架者”还是“被绑架者”,谁都难以预料贵阳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局面。云贵高原,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沟壑纵横,怪石嶙峋,高山巍峨,大江湍急,雄奇而不失玲珑,平常,来来往往,胜似闲庭信步。今天却有所不同。一路上,大家心事重重,沉

默寡言，偶尔有一块飞石跌跌撞撞坠入杳无音讯的北盘江大峡谷，直让人心惊胆颤。“文松，听说你同意在协调意见上签字了？”州委副书记问同车的鄢文松。“谁说的？”鄢反问。鄢又接着说：“我可没说过同意签字的话。”“哦……”书记的神情茫然，脸上掠过一丝阴云。

看来，即使把鄢文松“押解”到贵阳，这个差也没法交。

三天前，国家工商局副局长兼商标局局长白大华偕同国家商标局、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贵州省工商局、省轻工厅等有关领导和部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由北京而贵阳，来到偏僻的兴义，协调解决贵州醇酒厂和茅台酒厂已有七年的纷争。

这可是黔西南州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亦是名不见经传的兴义市和贵州醇酒厂这个县局级国营企业的殊荣。据说，国家商标局长亲自到一家企业来协调纷争尚属首次。

这可是给足了黔西南面子，更给足了黔西南压力。

白局长说：“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协助省、州、市各级领导调解两厂商标纠纷问题。你们两厂的纠纷已有七年多了，如果两厂的纷争能协调解决，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省轻工厅副厅长葛长瑞的开场白则为此次调解定了基调和原则。他说：“我这次陪同白局长来，是受省政府的委托，协调解决茅台酒厂和你们厂的纠纷问题。我们认为，如果继续拖下去，对两厂的发展，对我们整个贵州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害的。省政府从维护两厂的利益和整个贵州经济利益出发，提出了三条协商意见。”这三条意见的简洁表述为：一、“贵州大曲”的“贵州”商标续展是符合程序的，就不要再纠缠了；二、茅台酒厂让贵州醇酒厂无偿使用“贵州”商标，但是要到工商局办理商标使用协议；三、茅台酒厂和贵州醇酒厂共同生产“贵州醇”，但是，茅台产的“贵州醇”瓶型和包装要改动，以示与贵州醇酒厂生产的“贵州醇”的区别。

白局长说：“我的想法是，我们今天最好能搞出一个纲领，一

个最高纲领或最低纲领，也就是你们首先提出看法和要求。当然，我知道你们有自己的苦衷，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有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能在省政府三条意见的基础上，拿出一个方案来。省政府提出，要茅台酒厂改变外包装，这条意见是很好办的，我想也很可行。现在我跟鄂厂长说句实话，茅台酒厂那边，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看来，你们都有感情用事一面。我想，我们都把感情克制一点，丢开一切感情因素，最后把纠纷调解好。关于茅台酒厂续展商标问题，我想对鄂厂长解释一下，续展的程序是完全合乎手续的，况且关于续展问题，是对还是错，也很难把握，标准是什么？根据什么来判断？当然这是法律上的事，我们只是议论而已。对于这件事，曾经引起你们两厂对我们的误解。茅台酒厂说我们偏你们厂，你们厂说我们偏向茅台酒厂，其实呢，我们哪个也没有偏。我们今天不是想来打官腔，这个官腔我打了近十年了。我也曾经搞过企业，知道企业很难搞，搞好更不容易。我们应该想出一个通融的办法。当然，我不是坚持我的意见，你们可以通过法律解决，那是你们的权利，也是法律的义务。但是，法律程序是很复杂的，可以偏向这一边，也可以偏向那一边，不见得就会令人满意。我可以下个结论，如果双方都坚持己见，那么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但我希望你们给我留点后路，给我一个回旋的余地。”

一个是国家主管部门的最高领导，一个是省行业主管领导，后者还申明受省政府的委托并携带着省政府三点原则方案的尚方宝剑，该说的话都说到，可谓是泰山压顶之势。在场的州市两级政府官员，都明白开场白话中有话，无论他们有什么想法；有多大的不情愿，都要与省政府保持一致，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下级服从上级，是行政系统解决问题和矛盾最基本的原则，虽然他们曾强有力地站在地方立场上向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阐述过意见，虽然他们五月份齐聚广州，在法庭外为贵州醇酒厂后援助威，亦不能推翻这个原则。眼下这场戏，与其说是演给“贵州醇”和

鄒文松看的，不如说是演给他们看的。鄒文松是市管干部，贵州醇酒厂是市属企业，球，分明在他们怀里。端正他们的态度，似乎是顺利解决“贵州醇”和鄒文松问题的前提条件。再说了，州市两级政府刚刚换届，新班子里是否有权威有能力，能否按省政府的意见协调处理好这场轰动全国的官司，无疑是块试金石。退一万步说，省政府的面子总得给吧？行业主管部门的面子总得给吧？国家商标局局长的面子总得给吧？更何况白大华已把话说得如此白了！其中利害，非同寻常。

在诸多利害因素下，各级政府的默契和联盟便是必然的了，齐心协力拿下鄒文松这一关似乎也是必然的了。

可这鄒文松偏偏谁的面子都不给！使这有各级要员参加的协调会充满了火药味，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鄒文松说：“白局长，我认为，省政府提出的‘三个尊重（即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法律）’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理解不一样。我们从1983年搞出‘贵州醇’，是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这你是清楚的。就是季克良（注：茅台酒厂厂长）本人，当着我的面，也不得不承认‘贵州醇’不是茅台酒厂研制的。这不是很清楚吗？‘贵州醇’是我们的果实，是我们贵州醇酒厂的，这就是历史，应当尊重。对于尊重法律，一方面要我们尊重法律，一方面省政府却在认为我们侵权的基础上作出了三条决定，这是很武断的。我们不能接受。关于侵权问题，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当然我们很糊涂，不知道我们究竟侵了‘贵州茅台酒’什么权，现在国家商标局已不再这样认为了，所以现在不存在侵权问题，而省政府却在我们侵权的基础上作出这三条意见，我们怎么能接受呢？况且，在作出这三条意见时，省政府并没有作出和听取我们的意见，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不承认！……我们对茅台酒厂续展商标的程度并不怀疑，省政府当然也看到了这点。省政府要茅台酒厂改变外包装，这就足以说明茅台酒厂全版套用我们的外包装是不正当行为。我赞成白局长的意见，双方退避三舍，只要

茅台酒厂先停止‘贵州醇’的生产，我们就停止一切宣传。对于商标问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或法律来解决。茅台酒厂即使认为我们侵权，也不能用生产（与我们同一酒名同一包装的）‘贵州醇’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实际上，现在省政府已经倒过来，把茅台酒厂的这种不合法的作法合法化。”

白局长说：“省政府三条意见，鄢厂长认为是认定侵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认为不对。因为国家商标局没有认定谁侵权，法院也没有作出谁侵权的决定，所以是不对的。现在，我们就以鄢厂长提出的双方后退三十里这一条方案作为调解的蓝本，看看能否寻到一条解决的途径。按照鄢厂长的意见，可得出两条结论。一、茅台酒厂必须首先停止生产‘贵州醇’，二、关于商标问题，茅台酒厂停止生产后，仍然可以起诉你们，你们再同他们打官司。但我仍要申明一点，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你们再打官司，避免你们两败俱伤。”

鄢文松坚持说：“省政府提出两家共同用‘贵州醇’，这个‘共同’对我们是很不公正的，以后还将因此产生很多后果。比如‘安酒’、‘贵阳大曲’等都是因为几个厂采用同一名称而产生质量不合格，最后失去市场。省政府提出的是两家共同用‘贵州醇’，而不是只共同用‘贵州’二字，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白局长奉劝道：“其实，你们‘贵州醇’靠质量和营销占领市场，茅台酒厂的‘贵州醇’是无法与你们相比的。听说他们的酒还积压在仓库里。我想，‘贵州醇’他们能搞出来，但是你们灵活大胆的营销方式是他们无法做到的。我相信‘贵州醇’的市场永远是你们的。只要他们改了包装，改了字形，那还有什么呢？鄢厂长，你如果还能退一点，关于商标续展问题，我保证可以解决好。”

对此，鄢文松仍不退让。他说：“白局长，其他我不想多说，只有在妥善解决好第三条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解决第一、二条。茅台酒厂硬要全版套用我们的外包装，和继续使用‘贵州醇’三个

字，这是绝对不行的。从两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建议茅台酒厂改名，我们已经答应前面两条了，茅台酒厂再不退让，那就不公平了。”

白局长紧追不放，说：“我再申明一点，如果茅台酒厂把外包装和字型都彻底改变一下，（生产‘贵州醇’）你看行不行？”

“不行！两家不能共用‘贵州醇’三个字。这里我想提醒茅台酒厂，他们当初生产‘贵州醇’就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希望茅台酒厂再不要这样继续下去，否则他们将越陷越深，最后将把‘国酒’的脸丢尽！这次调解，应该是茅台酒厂后退的最后台阶。”

如此僵持的局面，逼着地方政府出来表态了。市委书记周国才说：“我们认为，兴义生产的贵州醇虽然是名牌产品，但还受不到法律的保护，打官司不一定能告得倒茅台酒厂。我们看省政府的三条意见还是可以考虑的。”

地方政府背后捏咕好的态度一亮相，就等于把鄢文松给孤立和“出卖了”！如今，阵营划得清清爽爽。鄢文松哀伤万状，怒火冲天。他不能不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他大声说：“周书记，即使你们同意了，我也决不同意！如果说省政府真心是为了黔西南州的经济发展，那么，他们应该首先制止茅台酒厂这种掠夺我们果实的行为！”

鄢文松摊牌了。他摆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架式说：“这次有最高的有关领导亲自到厂里来，我们非常高兴。在这次高层次协调下，茅台酒厂应明智地退下去。现在趁我们退让，他们也应该退让，等以后我们在营销上打败他们，那他们的面子就丢尽了。我想，我们两家这样打下去不一定会两败俱伤，即使出现最坏的局面，我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打算。”

一场本以为能皆大欢喜的高层调解，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鄢文松“犯上作乱”、敢于在完全孤立的险境下向强大的行政权力挑战，以及各级要员失望地返回贵阳，着实把立了“军令状”的州市两级政府悬在了半空中。